

# 博物馆、文化遗产与教育

「新挑战 新启示：岭南博物馆与教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广州博物馆

华南农业大学农业文化与乡村旅游研究中心  
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

◎ 编



# 博物馆、文化遗产与教育

“新挑战 新启示：岭南博物馆  
与教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广州博物馆  
华南农业大学农业文化与乡村旅游研究中心 编  
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

主 编：程存洁 倪根金  
副主编：赵 飞 白 琰

中国农业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博物馆、文化遗产与教育：“新挑战 新启示：岭南博物馆与教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广州博物馆，华南农业大学农业文化与乡村旅游研究中心，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历史遗产研究室编；程存洁，倪根金主编.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 4

ISBN 978-7-109-17713-0

I. ①博… II. ①广…②华…③华…④程…⑤倪… III. ①博物馆学-学术会议-文集②文化遗产-中国-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G260-53②K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7118 号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125)

责任编辑 穆祥桐 孙鸣凤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3 插页：1

字数：357 千字

定价：38.0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新挑战 新启示：岭南博物馆与教育”学术研讨会代表合影

# 目 录

## 国家博物馆之发轫

-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 ..... 邱龙虎 (1)
- 广州市立博物院成建始末 ..... 陈鸿钧 (17)
- 博物馆的类型与功能刍议 ..... 吴小强 (30)
- 印度：博物馆中的博物馆 ..... 魏露苓 宋明 (39)
- 佛山市南海区企业博物馆的兴起及发展前景 ..... 袁进 (50)
- 浅谈“数字化博物馆”的发展与建设 ..... 叶伟华 (60)
- 建设华南农业大学博物馆的若干思考与建议 ..... 倪根金 (66)
- 华南农业大学博物馆建设中的  
标本资源调查 ..... 赵飞 谢萍 朱嫦巧 倪根金 (76)

## 免费开放后纪念馆的社会教育功能探析 ..... 田苹 (90)

## 高擎宣教创新大旗，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品牌

- 鸦片战争博物馆宣教创新经验和做法 ..... 张巨保 (99)

## 广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解说系统

- 调查研究 ..... 石秀峰 陈丽莹 叶清红 张励怡 卓瑶专 (110)

## 博物馆临时展览的宣传

- 以近年西汉南越王博物馆临时展览为例 ..... 黄明乐 (123)
- 农业史教研与博物馆教育合作的探索 ..... 曾玲玲 (132)
- 浅谈博物馆讲解语言和声音的运用 ..... 刘锦秀 (137)

- 浅议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的开发及实践 ..... 罗玮娜 (143)
- 论岭南乡村博物馆的建立与教育功能开发 ..... 赵仁程 (153)
- 高校校史馆实物陈列艺术及教育意义 ..... 陈源 刘晓生 (162)
- 新发现朱启连手稿本研究 ..... 程存洁 (169)
- 广州汉墓出土的动物俑与汉代农业  
——以动物养殖为中心的考察 ..... 宋平 (191)
- 对广东成为近代中国思想解放之发端的历史学思考 ... 叶芳 (199)
- 开展广州农业文化遗产普查、  
保护与申报刍议 ..... 倪根金 赵飞 陈志国 (209)
- 广东古村落保护与发展探索 ..... 王元林 (219)
- 增城市农业遗产的调查研究 ..... 赵飞 倪根金 章家恩 (229)
- 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佛山东华里的博物馆化 ..... 朱嫦巧 (246)
- 风水与清代番禺的乡村规划 ..... 朱光文 (257)
- 农业文化遗产现代化转型视角下的  
广州春运难题思考 ..... 关溪莹 (283)
- 岭南博物馆与岭南文化的普及与教育  
——以岭南戏曲的保护传承发展等为例 ..... 徐燕琳 劳锦英 (290)
- 建设城市边缘社区博物馆及文化功能开发浅议  
——以广州越和花鸟鱼艺大世界为例 ..... 张展 (298)
- 县乡村休闲旅游空间布局实证研究  
——以浙江省苍南县乡村休闲旅游为例 ..... 郑国全 杨岳刚 (307)
- 佛教寺庙历史的展览文本叙事结构探讨  
——以广州光孝寺为例 ..... 肖瑾 (320)

## 目 录

---

博物馆游客的旅游体验研究	
——以广东省博物馆为例 .....	陈美杰 龚金红 (335)
浅析旅游开发对舞蹈文化传承	
与发展的影响 .....	杨莹 陈莉莎 (350)
旅游开发对少数民族村寨社会文化的影响	
——以连南南岗排为例 .....	陈溢珊 (357)
学习，还是闲逛？	
——免费开放下广东省博物馆旅游者游览	
行为的调查 .....	彭阿娟 刘爱庄 黄雪琴 (376)
农业高校与博物馆界的一次有益交流	
——“新挑战 新启示：岭南博物馆与教育”	
学术研讨会综述 .....	谢萍 杨品优 杨柳 (390)
后记 .....	407

# 国家博物馆之发轫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

邱龙虎

在古城南京的中山东路坐落着一所仿辽宫殿式建筑，黄瓦红柱，在蓝天白云和院内草木石刻的映照下显得蔚为壮观。这就是南京博物院（原国立中央博物院）。很少有参观者知道，这所博物院曾承载着一段珍贵的历史记忆，铭刻着蔡元培、李济、梁思成、曾昭燏为代表的一代先贤在战火纷飞年代里的坚持和执着，无言诉说着一代学人创建国家博物院的奋斗历程。

## 一、国立中央博物院之筹建

自清末到民国初年，中国已有各类博物馆几十个，但“政府及各学术团体渴望有一完善之博物馆，汇集数千年先民遗留之文物及灌输现代智识应备之资料，为系统之陈览，永久之保存，藉以提倡科学研究，辅助公众教育”<sup>①</sup>，在蔡元培倡导下，1933年4月教育部在南京设立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历史学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担任筹备主任。除秘书处外，博物院下设人文馆、自然馆和工艺馆，筹备主任分别由考古学家李济、地质学家翁文灏和冶金陶瓷学家、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所长周仁担任。教育部所发文的《中央博物院设立意见书》指出：“自然馆中，求能系统的扼要的代表自然知识之进展，并求其利用中国材料。人文馆

---

<sup>①</sup>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 1933年4月—1941年8月筹备经过报告》，《民国档案》，2008年第2期，第27页。



中，求能系统的表示世界文化之演进，中国民族之演进。工艺馆中，表示物质文化之精要，尤其是关于实业及国防者，用以激励国人。”<sup>①</sup>

在傅斯年担任筹备主任的一年多时间内，“拟定本院进行计划，编制筹备处预算，筹建建筑经费，收购绘园古物，接洽各学术机关合作，商定古物陈列所所存物品划作本院人文馆基本物品，凡本院基础工作悉于是时筹拟妥善，分别进行”。<sup>②</sup> 最终因为在中央研究院事务众多难以分身而辞职，教育部于是聘请人文馆筹备主任李济接替傅斯年。李济上任后，根据《国立中央博物院暂行规则》成立了建筑委员会，翁文灏担任委员长，张道藩、傅汝霖、傅斯年、丁文江、李书华、梁思成、雷震和李济担任委员。1934年7月26日建筑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公推梁思成为专门委员，负责领导博物院的建筑工作。经与南京市政府多次磋商，最终在半山园旗地100亩的院基之外又划拨中央图书馆旧址空地93亩3分<sup>③</sup>，院基征用费用由国立中央研究院承担<sup>④</sup>，而建筑费用得到管理中庚庚款董事会的补助<sup>⑤</sup>。根据梁思成拟订的《国立中央博物院建筑委员会征选建筑图案章程》的相关条款，建筑形式在满足“近代博物院建筑之需要，并力求朴实及最大面积”的原则下“须充分采取中国式之建筑”<sup>⑥</sup>。在受邀竞聘的13人中，12人按时交图。以张道藩、杭立

① 梁吉生：《旧中国博物馆历史述略》，《中国博物馆》，1986年第2期，第80页。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33年4月—1941年8月筹备经过报告》，第27页。

③ 亩：非法定计量单位，1亩=667米<sup>2</sup>。下同。1937年2月中央博物院在办理完征收手续后正式接收。

④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工作报告1933年4月—1935年10月》，《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1935年第2期，第18页。

⑤ 1933年6月得到答复，计补助150万元。到1935年的11月领到了前一年度的建筑补助金15万元，加上后续补助共得到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补助60万元。

⑥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编：《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概况》，第2页，见：倪明：《可贵的尝试——原中央博物院建筑缘起与历史评价》，《东南文化》，2001年第5期，第87页。

武、梁思成、刘敦桢和李济组成的建筑图案审查委员会反复研究，最终确定兴业建筑事务所的本籍建筑师徐敬直的图案当选。按常理，国立中央博物院的建筑应该最能体现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悠久，但其时梁思成尚未发现唐代的佛光寺大殿，发现的最古老木建筑是辽代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并完全掌握了辽代的建筑特色。于是，在梁思成的指导下，徐敬直的图案由仿清式改为仿辽式。

建筑委员会在选聘建筑师的同时也开始了建筑工程的招标工作。根据建筑委员会第一次大会的决议，国立中央博物院的建筑分三期进行，第一期建筑为全院行政部门房屋全座和陈列馆一座，由自然馆、人文馆和工艺馆三个馆暂时公用。1936年3月，经招标和建筑委员会审议，最终江裕记中标，并于6月动工，11月12日举行奠基礼。工程初期进展顺利，按照进度可在1938年4月完工。但因“七七事变后”，“敌机肆虐，首都一日数惊”<sup>①</sup>，工程不得已在8月底暂行停工，其时“工程进度在房屋部分，陈列室后部屋顶梁等钢骨水泥工程全部完竣，前部保管库楼板及两边屋顶等水泥工程亦完成，惟正面大殿除楼板、梁柱、屋架及下层全部完竣外，其二、三两层仅成全部之二分之一，马路阴沟工程仅成三分之一，其他附属工程部分，如电气、卫生、空气调节、人造石、五金等或大部完竣，或及半未成，或付款而未来货，或来货而未装置，合全部工程计算，大约已完成者占百分之七十五”。<sup>②</sup>

与此同时，国立中央博物院的机构建制和收藏研究等工作也如火如荼开展起来。1935年9月，《国立中央博物院暂行组织规程》经国民政府备案公布。根据组织规程，国立中央博物院的任务是：“提倡科学研究，传播现代知识，保管国有古物，以适当之陈列展

<sup>①</sup>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 1933 年 4 月—1941 年 8 月筹备经过报告》，第 28 页。

<sup>②</sup>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 1933 年 4 月—1941 年 8 月筹备经过报告》，第 28~29 页。

览辅助公众教育”<sup>①</sup>。组织规程还规定，“国立中央博物院置院长一人，兼任，由理事会推举提请教育部呈请国民政府任命之，综理本院及所属各处馆事物”。“国立中央博物院设理事会，其执掌如左：一、国立中央博物院院长之推荐；二、国立中央博物院预算及决算之审议；三、国立中央博物院物品保管之监督；四、国立中央博物院专门委员会之设立；五、其他重要事项”。<sup>②</sup>根据组织规程的相关规定，是年11月，教育部商同中央研究院聘请蔡元培、王世杰、胡适、黎照寰、李书华、秉志、朱家骅、张道藩、翁文灏、李济、傅斯年、罗家伦、顾孟余等13人为理事<sup>③</sup>。1936年4月15日，理事会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公推蔡元培为理事长，傅斯年为秘书。理事会成立后，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又开始添加助理员名额，并延聘郭宝钧等为名誉专门委员，到各地去调查发掘。当然，国立中央博物院的标本不能静等发掘，而是采取多头并进的方针，先后将绘园古物、善斋颂斋古物、北平历史博物馆藏品、古物陈列所藏品及其他部分国有古物收入囊中。其中，绘园古物有20多件，原是闽侯何叙甫的私人藏品，包括巨鹿瓷器和历史铜器佛像等，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南北朝的石刻雕塑<sup>④</sup>。善斋颂斋古物共有100多件，是卢江籍著名收藏家刘善斋的私人收藏，多为名贵物品，其中口令尊一件至为瑰宝。北平历史博物馆的藏品有21万多件，种类达20多种，包括太学器皿、汉简、唐人写经、甲骨刻辞等，原为国立中央研究院接收，后转给国立中央博物院<sup>⑤</sup>。古物陈列所的藏品是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377次会议决定划给中央博物院作为基本藏品，这些原藏于清朝内府的物品包含有三代鼎彝、历代书

<sup>①②</sup> 教育部编：《教育法令汇编》第1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4页。

<sup>③</sup> 组织规程规定理事为11~15人。

<sup>④⑤</sup>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33年4月—1941年8月筹备经过报告》，第29页。

画、陶瓷、丝绣和髹漆等，达 5 403 箱之多<sup>①</sup>，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铁道部顾问斯文赫定在新疆拾到的古物 3 箱、甘肃出土的新莽权物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赠送的路边捡到的宋元时期 7 枚银锭等国有古物也交由国立中央博物院保管<sup>②</sup>。另外，东莞容颂斋 32 件藏品也转让给中央博物院<sup>③</sup>。与此同时，教育部将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的门票收入的一半计 9 000 多英镑拨给国立中央博物院工艺馆，用于购置西方艺术品<sup>④</sup>。这时国立中央博物院已跻身于中国两大博物院，史称“北有故宫，南有中博”。最值得一提的是，为协助国立中央博物院，作为国内最高的学术研究机构，国立中央研究院将该院历年搜集发掘物品中有适合国立中央博物院三馆陈列的物品全部赠与，包括殷墟出土的 3 000 多片甲骨文。受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影响，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也许诺相赠其历年所收集的地质古生物及古物标本。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当时已有条件下积极开展研究工作，如在 1935 年的春秋两季和 1936 年秋参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殷墟和山东日照的考古发掘工作，根据《中央博物院与中央研究院合作暂行办法》，所发掘物品先由中央研究院一方研究保存，然后留国立中央博物院陈列展览；另一方面，为避免重复，中央研究院已有的研究科目，中央博物院也不再设置。

## 二、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之西迁

“七七事变”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就开始着手准备，将藏品分别装箱，一部分藏品与中央研究院的物品一道经江西到湖南，藏

<sup>①</sup> 李荔：《抗战时期的中央博物院文物西迁》，《中国文化遗产》，2009 年第 2 期，第 102 页。

<sup>②③</sup>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 1933 年 4 月—1941 年 8 月筹备经过报告》，第 29 页。

<sup>④</sup>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 1933 年 4 月—1941 年 8 月筹备经过报告》，第 28 页。

在长沙，一部分藏品和故宫文物藏于南京朝天宫仓库，另一部分藏品藏于兴业银行，而办事处迁往沈举人巷华安里。1937年11月18日，国立中央博物院奉命西迁。于是，全体人员连夜装箱，将木箱内第一层铺上稻草，第二层铺上棉花，文物以草绳或麻绳捆扎，书籍和其他细软则在木箱内放上铁皮箱来防水防潮，并放置防虫药和豆类防蛀。为防止文物迁移途中全军覆没的不测，西迁时期中央博物院的文物采取南、中、北三路线行进。南路文物主要是先前古物陈列所和故宫博物院参加伦敦国际展览会的80箱展品，加上为选取伦敦国际展览会筛选下来的其他精品如散氏盘、王羲之的《快雪时晴贴》等。南路文物自1937年8月14日出发，溯江而上到汉口，再转火车至长沙，存放于湖南大学图书馆底层。1938年8月，长沙危急，又将这批文物迁往贵阳，暂存贵阳一公馆中。1939年1月23日，为安全起见，又将文物搬至花岩洞，直至1944年12月湘桂战役后再次辗转搬迁到四川巴县的飞仙岩山洞存放。中路文物高达9331箱，分两批迁至汉口，存于汉口平和洋行仓库。1个月后又奉命迁往四川，于是集中运往宜昌。由于长江上游无法行驶大船，改由小火轮分19批次运往重庆，并于1938年2月全部达到重庆，其中100多箱与故宫文物一道存于四川乐山县安谷乡的“朱、潘、刘”三姓公用的祠堂，其他的存放在和国立中央研究院合建于沙家坪重庆大学的临时仓库里，并在新市上中二路设立办事处负责维护等相关事宜。1939年5月日军对重庆实行大轰炸，为最大程度减少危险，临时仓库的文物又被分散至各地。是年10月国立中央博物院迁至昆明龙泉镇。1940年6月后日军开始频繁轰炸昆明，8月中央博物院再次被迫迁移至四川南溪李庄，以张家祠堂作为存放文物和办公场所，工作人员则居住在镇上羊街和上坝。北路文物起步较晚，1937年12月10日南京沦陷之前才启程，经郑州、宝鸡，到1938年6月才到达汉中，分别藏在汉中文庙、范式祠堂、张寨大庙和马甲祠堂4处。1939年2月，北路文物再次迁移至成都大慈寺，7月转移到峨眉山大佛寺和武庙两地。1942年4月最终藏在峨

眉山麓的土主祠和许氏祠堂。<sup>①</sup>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道路交通并没有今天这样便利，车辆严重不足，而且战时物价高涨运费困难，部分地段甚至有土匪出没，在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博物院的大迁移保住文物的同时其实一定程度上保住了传统文化的传承。

由于国立中央博物院准备早且安排周详，“计遗于南京者只有少数笨重石器及标本模型，举凡历年搜集之大河南北出土珍品悉数西移，档案簿册亦一概移运”<sup>②</sup>。但是，国难当头，难免还会小有损失，计损失古物有 1 679 种，包括曾昭燏在南京傅厚岗 34 号藏的古物 86 件又 1 箱，书籍 55 件又 2 柜及古服饰衣物，其中不乏湖北官书局和金陵官书局刻本及碑帖、法帖、拓本，还有南齐刻石佛 1 尊、山西赵城县佛寺壁画 4 块、乾隆五彩瓷扁豆 8 件、同治五彩瓷盖碗 20 件<sup>③</sup>。

虽然辗转于西南各地，工作条件等不尽如人意，甚至生存都出现困难，但中央博物院并没有因此放弃相关工作，现代国家博物馆的基本职能都得到体现，尤其是调查采集、研究、展览、收藏、编辑等工作成果丰硕。

### （一）调查、采集、发掘与研究工作

中央博物院在西迁时期的调查采集和研究一直没有停止，最为著名的几次调查是川康调查、大理考古发掘、贵州民间艺术考察、汉代车制研究、旧式手工业采集研究、中国建筑和附属艺术整理以及彭山、西北考古发掘。因篇幅所限，仅举一二以窥全貌。以川康调查而言，自 1937 年就已经开始，西迁后并未停止，先后对罗罗<sup>④</sup>等十几个民族进行了调查，测量体质，记录语言，探源历史，叙

<sup>①</sup> 李荔：《抗战时期的中央博物院文物西迁》，第 103~105 页。

<sup>②</sup>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 1933 年 4 月—1941 年 8 月筹备经过报告》，第 30 页。

<sup>③</sup> 王炳毅：《侵华日军对南京历史文化和文化遗存的劫掠摧残》，《文史春秋》，2010 年第 7 期，第 62 页。

<sup>④</sup> 罗罗：彝族旧称。

述环境，分析其生产、经济、组织、文化等，并收集了标本十几箱。1939年夏，马长寿整理出历年凉山罗夷考察报告，分为14编，涉及该地区的考察经过、人员体质、语言文字、起源神话、历史、迁移史、谱系、地理环境、社会组织、宗教信仰、技术文化、物质生活、历法习俗等内容。此后又在凌纯生的带领下进行后续调查研究。这些都为了解少数民族的文化风俗等提供了丰富的一手资料。

汉代车制研究更是中央博物院里程碑式的贡献。抗战爆发后，教育部拟定在沦陷区抢救的学人名单里就有一个人叫王振铎。作为中央博物院的助理研究员，王振铎开创了一门新型学科复制古代科技作品。众所周知，指南车、记里鼓车等是中国科技史上可圈可点的成就。为了博物馆陈列需要，并显示中国古代交通工具的进步过程，王振铎通过收集车之名类、画像、实物著录等几千多件（种），其中，车名方面除说文、释名、冬官考工、汉晋与服志等专著外收集史证、旁证、车体、名辞等2320件，画像方面收集到汉代金石材料中有车制图像的139幅，在印章、漏壶、壁画等收集到车类型7种，实物著录方面收集到车子25种，还有其他车饰、与车制无关的画像等，最终将汉代车制复原出来，并完成研究论文15万字<sup>①</sup>。中央博物院对此颇为自豪，“凡此合文物、实物大量收集之工作，副以图像、模型作紧密比较之研究，于汉代车制真相虽不敢云密合无间，其准确程度已突过逊清时代一切经学家之尝试”<sup>②</sup>。

为了解全国文化起源，中央博物院自1938年起开始大理考古发掘，并发现“苍洱文化”，与仰韶文化或龙山文化不同，这一史前文化自成一系统。而以海归学者吴金鼎为首的彭山考古收获众多，可供博物馆展览和在考古学上有特殊意义者近千件，“春宫”石刻等属考古史上首次发现。彭山汉墓的研究证实了佛教在东汉时期就已经传入了今四川地区。继彭山考古后，中央博物院又继续开始了西北考古，1943年与其他单位共同组织了西北考察团，其中对敦煌莫高窟的研究是国

<sup>①②</sup>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33年4月—1941年8月筹备经过报告》，第31页。

人第一次系统的敦煌学研究。在西北考古中，考古学家夏鼐通过对齐家文化古墓的发掘，从地层学上证实了中国彩陶早于西方，从而驳斥了瑞典学者安特生“中国彩陶文化西来说”的观点。

因“中国建筑在世界各系建筑中，为东方最卓著之独立系统。其全体布局与结构外观之基本原则，则自有史以来，迄于最近，薪火相传，线索不紊，尤为人类文化中罕见之现象”。中央博物院工作计划书中对中国建筑做出上述评价。为此，中央博物院与营造学社合作，由中央博物院支付工资，组成建筑史料编纂委员会，开展对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并制造相应的模型。此外，中央博物院在西迁数年内还开展了自然标本采集、琴台王建墓整理等相关工作。

## （二）展览教育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暂行规则》中明确提出“提倡科学研究，辅助民众教育”的宗旨。由于考古发掘在当时还不常见，所谓“掘人祖坟”被认为是不吉利的事情。夏鼐在西北敦煌考古时，曾经聘请了一位姓袁的河北厨师，在佛爷庙发掘完成后便辞退了，后来据说该厨师不久得怪病去世。当地人以讹传讹，说袁姓厨师帮人挖坟所以被鬼捉走。此类事件并非个例。在李庄，当地村民偶然间看到博物院的人头盖骨标本，误传中央博物院的一批学者吃人，即所谓“下江人吃人”的传说。为了开启民智，消除民众的误解和恐慌并同时展示中央博物院筹备以来的相关成就，获取等多的社会支持。筹备处在李庄先后举办了多种展览。1944年的第一次展览是贵州夷苗衣饰，涵盖仲家、花苗、青苗三族，花苗、青苗为苗族的两种，仲家为夷人<sup>①</sup>。除实物展出外，配上着色的图案画，附上图表照片等作说明。在9天的展览时间内，参观者近万人<sup>②</sup>。第二个展览是汉代车制展览，每种车配上模型、照片与构造图，在内容和

① 在史籍记载中，布依族有“仲家”、“夷家”等称谓。

② 匿名：《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之各种展览》，《图书季刊》，1944年第2~3期，第109页。



形式上前所未有。为了让公众了解历代建筑情况，中央博物院在李庄的陈列室还举办了“中国历代建筑图像展”。在该年的双十节，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再次在李庄的陈列室举行“麽些”<sup>①</sup>文物展览，展览内容包括民国时期麽些民族的分布、古代麽些迁徙路线图、木氏土司世系表、木氏碑拓本等，分麽些人的生活、文字、宗教三部分展出。其中，宗教最长卷的图画达 11.6 米，上面画有十八层地狱到三十三天的层次和道路<sup>②</sup>，说明了佛教文化和麽些人自己的宗教文化的融合。此外，还因教育部命令 1943 年在重庆举办的展览，分为石器类和铜器类，共计 1 377 件，共装 9 箱，附装古物木盒 157 个另附图表一小箱。李济专门为展览撰写了《远古石器浅说》的文章，从进化论角度阐述了人类如何使用工具以及石器演进的过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举行的展览之所以如此受欢迎，主要在于先进的理念和方法。筹备处主任李济曾谈起科学馆的陈列，“无论采用何种计划，审查计划最紧要的标准，应该是看它：（1）是否有教育价值；（2）是否宣传真正的科学知识；（3）是否有社会的意义；（4）是否可以用科学的方法陈列出来。切不可无辨别地、聚集一大堆现代工厂出品，或杂乱无章地今天说东，明天说西，使一般参观的人耳聋眼花、莫名其妙。要达到科学陈列的目标，有极其繁重的准备工作，所以我个人极不赞成一个科学馆兼营其他的业务。就是相关的研究工作，也可以留给专门研究的机关去做；若其不然，一定是要‘劳而少功’的”<sup>③</sup>。此外，1944 年筹备处主任李济还应重庆电台的邀请，代表博物院作了“博物馆与科学教育”的讲座，结合战时情况谈博物馆在科学教育中的重要性<sup>④</sup>。

① 麽些：纳西族旧称。

② 匿名：《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之各种展览》，《图书季刊》，1944 年第 4 期，第 110 页。

③ 李济：《如何办科学馆》，见：张光直编：《李济文集》卷 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31 页。

④ 李济：《如何办科学馆》，见：张光直编：《李济文集》卷 5，第 13 页。